

# 批评话语分析的认知语言学方法

周红英

(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 南京 210039)

〔摘要〕 将意识形态研究从语言层面深入到话语幕后,从认知层面解构或重构话语生产者如何通过操纵话语受众的概念化认知来对其意识形态进行合法化的过程,是认知语言学取向的批评话语分析实践。话语是特定意识形态的产物。作为话语的构成,话语中的概念化表征方式如隐喻、转喻、注意、句式及观察者的主体性处置承载了话语中不平等的社会权力关系而表现出同话语意识形态的连贯性特征。

〔关键词〕 批评话语分析;意识形态;认知语言学

〔中图分类号〕 H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2689(2014)01-0019-07

连贯性特征。本文拟探讨这些日常概念化表征方式的意识形态功能。

## 一、引言

传统批评话语分析把话语作为社会实践,通过分析词汇-语法来解构作为话语意义的意识形态,即 Fairclough<sup>[1](67)</sup>所说的“那些被植入到话语实践的内容和形式中,用以建立、维持和改变权力、控制和剥削等社会关系的、关于现实的建构”。社会决定论反映了传统批评语言学对社会—语言关系的认识。所谓社会决定论,就是主张社会结构(比如阶级或其他社会关系,话语和非话语的各种准则、传统)塑造和约束话语的各个层面并且是话语事件发生变异的重要参数<sup>[1](63)</sup>。而 van Dijk<sup>[2](3)(4)</sup>提出,社会因素对语言使用的影响不是直接的,而是进入了使用者的认知,后者主导语言的选择和意义的实现。认知具有主体性和主体间性:既是属于个人的经验模型,又是集体共享的社会文化知识、态度、意识形态、准则和价值观的实例化<sup>[4](53)</sup>。

认知语言学呼吁将传统批评话语分析的意识形态研究从语言层面深入到话语幕后,从认知层面解构话语生产者如何通过操纵话语受众的概念化认知来对其意识形态进行合法化。话语是特定意识形态立场的产物<sup>[5](121)</sup>。作为话语的构成,话语中的概念化表征方式如隐喻、转喻、识解视角及句式承载了话语中不平等的社会权力关系而表现出同话语意识形态的

## 二、隐喻与批评话语分析

在认知语言学研究,隐喻同批评话语分析结合产生的批评隐喻分析是发展较早、至今已较为成熟的认知批评范式。根据 Musolf<sup>[6]</sup>的考察,早在二战前,关注德国纳粹意识形态和话语的文化批评研究及话语分析就产生了批评隐喻分析的原型。Kenneth Burke<sup>[6]</sup>在二战前发表的 *The Rhetoric of Hitler's Battle* 是早期的批评隐喻分析文章。Kenneth Burk 对希特勒的反犹太话语研究揭示,Hitler 将宗教概念(devil)投射到犹太民族,将宗教含义(对魔鬼永久而无情的打击)转移到社会政治领域(消灭犹太人),将其希望的结局(象消灭魔鬼那样消灭犹太人)呈现为病害的祛除(cure)。纳粹话语通过(宗教和疾病)隐喻唤起了德国人的心理需要,使德国纳粹对犹太人的屠杀合法化。

隐喻之所以成为利益集团传播意识形态思想的重要工具,是因为隐喻的选择性概念映射产生凸显/隐匿功能,使得目标域可以按照使用者的意图被片面地再现<sup>[7](13)</sup>,比如,欧洲移民话语中常常可见将移民(或难民)隐喻为 flood 的现象,该隐喻凸显了因大量移民或难民到来而为本土居民带来灾难的一面:

〔收稿时间〕2013-06-21

〔作者简介〕周红英(1975-),女,四川成都人,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讲师,博士。

(1)The ruling opens the *floodgates* for 666 asylum seekers to claim they have been treated inhumanly.

——*The Express*, 22 may, 2004

另一方面,人们在生活经验中形成的态度、情感、信仰及价值判断与隐喻形成一个连贯的系统<sup>[7](21)</sup>。比如,西方国家的商业话语往往借助 WAR, FIGHTING, BATTLE, CONTEST, RACE 等概念来描写经济或商业活动,这些隐喻凸显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利润至上的竞争与冲突这一特征和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想,同时也隐匿了市场互动中相互合作的一面,而那些有利于竞争的素质如 aggressive, independent, unemotional, competitive, logical, adventurous, self-confident, ambitious 等也都获得了积极的评价意义并成为西方社会所推崇的品质<sup>[8](236)</sup>。常规隐喻表征的认知模式和蕴含的价值观具有广泛的社会可接受性,因而能够成为有效操纵话语受众的认知、情感或价值判断、宣传意识形态的工具<sup>[9](12)</sup>。Lakoff<sup>[10](xxv)</sup>认为,隐喻为政治思想和意识形态提供特定的经验框架,其目的之一就是利用其社会接受性将话语者的政治利益和主张合法化,另一方面也唤起话语受众的认知和情感共鸣。批评隐喻研究就是分析和揭示意识形态话语中隐喻如何基于其凸显/隐匿功能来主观、片面地再现目标域,创造符合话语受众社会认知的二元对立范畴,建构不平等的社会权力关系并使其合法化。这些二元对立范畴通常包括善-恶、文明-野蛮、洁净-肮脏、理性-不理性、英雄-恶魔、强大-孱弱、成熟-幼稚等,是“内群体”与“外群体”或者说“我们”与“他们”的实例化。

### 三、转喻与批评话语分析

转喻也是人类认识世界的基本思维方式和认知工具。同隐喻一样,转喻也具有凸显/隐匿的认知策略。Langacker<sup>[11](69)</sup>指出,转喻是注意凸显点从源域转移到目标域的认知运作。转喻以具有心理凸显性的源域为认知参照点来通达目标域,在这个认知过程中,源域作为认知参照点,是认知主体观察目标概念的一面核心“棱镜”<sup>[12](906)</sup>。Barcelona<sup>[13](12)</sup>也强调,转喻将源域的认知结构投射到目标域,从而向目标域强加了一个观察视角。转喻源域的选择对于目标概念的识解有着关键的影响。其中重要的影响之一就是,被选为参照点的概念内容成为认识和描写目标域的凸显特征,规定了目标领域的特定概念化认知方式。这一点可以从以下方面来解

释:从注意力的角度看,转喻作为常见的焦点凸显手段,凸显了两个关联概念域的前景-背景或侧面-基体配置关系<sup>[11](69)</sup>,目标域成为前景/侧面,源域成为背景/基体,而背景/基体就是用以描写前景/侧面的概念内容<sup>[14](30)</sup>。隐匿是伴随凸显同时产生的认知结果,作为认知参照点的源域成为界定目标域的凸显特征。这也意味着目标域的其他特征被屏蔽。转喻在确定一个参照点的同时,必然忽略或屏蔽了其他可以描写目标域的特征;而目标域就通过源域这一凸显特征得到识别和指认。转喻对目标域的选择性凸显/隐匿效果为话语传播特定的意识形态提供了理据。

#### (一)转喻与刻板印象化

刻板印象(stereotype)这个概念自美国新闻记者兼评论家 Lippmann<sup>[15](183)</sup>提出后,在社会心理学中被广泛研究。刻板印象是过度概括或过度简化后得到的范畴特征,具有非理性、情感评价性、社会或文化认同性,并具有一定的固化程度,不轻易发生改变<sup>[15](183)</sup>。刻板印象不仅是描写性的,还是评价性的,分为积极的刻板印象和消极的刻板印象。批评话语分析往往更加关注后者。

刻板印象在本质上是概念性的,可以通过语言来唤起。从认知语言学的角度说,刻板印象属于语言提示唤起的百科全书式知识。刻板印象的唤起基于“部分通达整体”的转喻联系。比如,在传统西方社会的“母亲”范畴中,家庭主妇这个次级模型无疑是比其他次级模型(如生育型或抚养型)更好的范例,因此家庭主妇是传统西方社会中“母亲”概念的刻板印象(同上)。

刻板印象化的转喻选择个别的、消极的特征来描写范畴整体,其结果是,范畴中的其他特征被屏蔽,转喻以片面的图景来左右和影响话语受众对目标范畴的判断和认识。其次,转喻以部分来通达整体,抹杀了个体与群体之间的差异,将个体放在群体的参照框架内,选择特定个体的消极经验与特质并加以扩散、放大、凸显为群体的本质特征。比如下面这则代表性的报导:

(2)昨天市公安局刑侦总队向媒体透露说,一个妻子长期不在身边的民工,竟然色心大起,接连奸杀了三名拾荒女,此案已于10月25日告破。医学专家表示:农民工长期性压抑必然导致性冲动,轻微的冲动会导致心理疾病,严重的就会走上强奸犯罪之路,这一问题应当得到重视。

《北京晚报》2003-10-31:

一民工半年奸杀3名拾荒女

第一句话报道了具体犯罪人(一个妻子长期不在身边的民工)的具体犯罪事实。显然,犯罪人只是民工群体中的一员。第二句直接将笔触由第一句中特定的指称对象指向整个农民工群体(农民工),由个别民工的“性压抑”问题指向农民工群体的“性压抑”问题。表面上,话语通过一个特定的民工唤起民工群体而实现了与后续语篇的连贯性,但正是在建立这个连贯语篇的过程中,犯罪的个别民工被树立为整个民工群体的典型代表,犯罪人的个体经验、特征和形象也扩散化并强加给民工群体中所有的成员。这种跨越个体与群体的差异的转喻性连贯方式正是基于“医学专家”关于农民工这个“外群体”的刻板印象:前者的观念中已经剔除了农民工群体中的个体差异,而将该群体概念化为高度同质的理想个体的组合。

刻板印象是强加给目标群体的,这一点首先可以从转喻源域与目标域的关系来认识。Evans & Green<sup>[19]312</sup>提出,转喻联系往往依赖于特定的交际和指称条件而存在。Panther<sup>[17]361</sup>指出,转喻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源域与目标域的概念联系是偶然、暂时而非必然的,即源域并非通达目标域的必要条件。Panther(同上)将源域与目标域之间的偶然或暂时联系作为鉴别转喻的一条标准,除非是在特殊的语境中,源域与目标域之间的概念联系具有可撤消性。其次,内群体对外群体的描写和评价总是受到内群体自身的价值观、意识形态、信仰和目标的影响,而与目标群体自身的本质无关<sup>[19]506</sup>。因此,刻板印象是话语群体建构的他者形象,在深层次上折射了话语群体价值观、意识形态、信仰和目标等方面的宏观社会因素,也折射了两个群体之间不平等的社会关系。

## (二)转喻与施事神秘化

结合对“内群体”积极宣扬、抑制消极呈现的这一意识形态策略,转喻源域的凸显/隐匿功能可以用来抑制对“内群体”的消极呈现。负面事件的官方通报就常常利用转喻的凸显/隐匿功能来突显事件的非施事实体,抑制对“内群体”成员的消极呈现,实现施事的“神秘化”(mystification of agent)。

施事(agent)是行为事件的发起者<sup>[19]1</sup>,也就是引发行为事件的能量之源<sup>[11]356</sup>。在语言描写的事件结构中,施事是一个语义成分,没有固定的语法角色。典型的事件结构主要由[施事+事件过程+受事]构成,在语言层面的核心框架为[SVO]。从认知识解中注意力配置的角度看,典型事件结构凸显作为事件参与者的施事和受事及其关系,其中施事为主要凸显焦点。作为行为发起者,施事角色的另一个显著特征是为其行为承担责任<sup>[19]24</sup>。由于施事角色总是与责任相连,典型事

件结构凸显了施事角色,同时也凸显了其责任。

施事的凸显意味着其责任的凸显;减轻或掩盖施事的责任可以通过施事角色的背景化处理来实现<sup>[19]24</sup>。转喻通过突显事件的非施事实体而使真正的施事背景化或“不在场”,这就是施事的神秘化。Evans & Green<sup>[16]316</sup>提出,事件的ICM中包含的相关概念成分(如INSTRUMENT, AGENT, ACTION, OBJECT INVOLVED, CAUSE, RESULT, MEANS, MANNER)之间存在转喻联系,形成INSTRUMENT FOR ACTION、AGENT FOR ACTION、ACTION FOR AGENT等转喻。其中,某些非施事概念实体可以选择来转喻目标域(真正的施事),从而对施事及其承担的责任加以隐匿和掩盖:

(3) *An amendment to the Immigration and Asylum Bill going through parliament will exempt such people [asylum seekers] from the 1948 National Assistance Act.*

转引自 Hart<sup>[20]176</sup>

这句话包含了一个“结果代施事”(RESULT FOR AGENT),或者说“产品代生产者”(PRODUCT FOR PRODUCER)的转喻,被凸显的是非施事的客体(amendment)和受事(asylum seekers)及二者的互动,其中amendment是前景,asylum seekers是背景。这种识解方式使得真正的施事主体(amendment的生产者,即国会议员)“不在场”,从而将其责任掩盖起来。此外,国内新闻报道和政府公文中频频借助“集体代部分”的转喻起到将施事神秘化的惯用语莫过于“有关部门”。这个含糊其辞的指称常出现在媒体有意隐晦消息来源或新闻报道涉及负面新闻时转移谈论焦点,2010年被网友评为最讨厌的“神秘化”词汇。究其缘由,不外乎包含其中的双重隐匿——首先隐匿了真正的责任部门,其次又隐匿了真正的责任人——最终使之成为典型的相互推诿、敷衍塞责的代名词。

## 四、注意

注意是一个基本的认知心理现象,也是一个复杂的认知能力。在注意过程中,我们总是选择某个对象来作为焦点,焦点的周围即注意范围。在对任何一个场景的感知注意中,总有一个实体从注意范围中凸显出来。换句话说,观察者的注意力在不同程度上分配给注意对象。注意凸显的对象可以是独立的实体,也

可以是不同实体间的某种关系。在后一种情况下,注意的焦点又在不同程度上分配给处于这种关系中的不同实体。认知语言学用“射体”(trajector)和“界标”(landmark)来代表人的有限的注意力分配:注意所凸显的关系中,占据主要焦点位置的实体即为射体,居于次要焦点位置的即为界标。射体/界标的配置关系表现为图形/背景(figure/ground)。

Langacker<sup>[11](369)</sup>指出,射体的地位从来就不是事件或情景所固有的特征,而是取决于认知主体的识解。具体地说,在对某一个场景的观察中,我们实实在在看到的,取决于我们观察得多近,选择什么观察对象,最在意哪些因素,从哪个角度来进行观察<sup>[11](65)</sup>。同一个事件可以有不同的识解方式、不同的注意力分配,并选择不同的语言形式来体现。

从事件结构成分看,施事是有意引发或者执行某一行为的主体,典型的施事对其他实体施加物理影响或致使其发生某种变化。因此,在一个事件图式或行为链(action chain)中,施事作为引发相关行为的参与者,是“能量之源”。受事是被动承受施事的能量或影响的对象。施事-受事的关系是不对称的。施事-受事的不对称关系从物理意义隐喻性地投射到社会意义上,就隐含了双方权势关系的不平等。因此,施事-受事的角色配置体现了双方关系的不对称,也体现了双方权势的不平等。在对事件的识解中,由于更活跃的、占主导地位的事件参与者更易于从注意中凸显出来,射体作为焦点被缺省性地配置给施事或者其他最具施事特征的参与者,语言层面实现为在施事取向(agent-oriented)的结构<sup>[11](370)</sup>。原型的施事-受事结构中,作为语法角色的主语、作为语义角色的施事和作为注意中凸显角色的射体“三合一”,主语就是“引起非对称性互动的、更加主动的参与者”。

在事件结构的焦点配置中,注意范围内的射体和界标占据的焦点位置不同,在语言结构上的占位也不同。事件结构可以图式化为动作链(action chain)来表征施事与受事之间力的互动,动作链图式表征了事件过程中能量在参与者之间的传递,因此,选择了一种动作链就意味着选择了一种概念化方式:

在非对称性的动作链中,事件被识解为能量从施事(Beijing)到受事(Tokyo)的单向传递,事件的责任由事件中的能量传递者来承担,如图1。事件参与者角色的不对称性是话语生产者建构二者不平等的权势关系的认知策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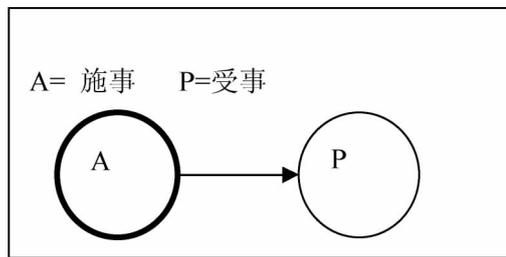


图1

(4) *Beijing* is pressing for *Tokyo* to acknowledge that the territory is up for grabs.

*The Washington Post*, 4 June, 2010

非对称性事件除了交互事件(如上例),还包括移动事件。移动事件中没有参与者之间的能量传送,只有一个参与者(称为客体 theme)的移动路径。识解过程中注意力焦点有“施事”取向和“客体”取向(客体 theme 是具有被动特征的语义角色,是受事 patient,移动物 mover,经验者 experiencer 的总称)。这两种注意力焦点取向代表了识解过程中的两种策略,每一种策略都产生于人类的基本经验。“施事”取向反映的是有生命、有情感和行为意志的实体将其力量作用于世界,目的是取得或维持对世界的控制,如上一例。而客体取向反映了这样的现实:世界以某种特定方式布局,不同的实体展现各自不同的特征,占据不同的位置,因此它们彼此之间对人类心理可及性以及对人类影响的易感性上有所不同。每一种语言都存在这两种编码策略,所不同的是具体的表现和表现出来的相对比例。“客体”取向的策略可以将事件识解为移动事件(motion)而不是交易事件(transaction),这一识解方式是常用于实现委婉陈述的框架化策略<sup>[11](366)</sup>,或者用于制造语言的客观化效果(见下一节)。

## 五、构式语法

上文关于非对称性事件中交互事件和移动事件的探讨可以从构式语法的角度来进行。Goldberg<sup>[21]</sup>提出五种基本论元构式,这五种论元构式包括:1)双及物构式(Ditransitive construction) 2)致使移动构式(Caused Motion construction) 3)结果构式(Resultative construction) 4)非及物移动构式(Intrans. Motion construction) 5)意动构式(Conative construction)。Goldberg<sup>[21](9)</sup>认为,这几种基本的论元构式类型是对人

类基本的经验事件场景的概括。这些经验格式塔包括:某人意愿性地将某物传递给某人,某人致使某物移动或改变状态,某人经历某事,某物移动,等等。移动事件通常以非及物的移动构式来表征<sup>[21][118]</sup>,而交互事件与及物性的致使移动构式对应。下面这句话来自美国《华盛顿邮报》的一则关于钓鱼岛事件的涉华报道。

(5) Another worrisome incident occurred on January 8<sup>th</sup>, when four Chinese surveillance ships entered Japanese-controlled waters around those islands for 13 hours.

*The Washington Post* 3 December, 2013

从构式类型看, enter 所在的句子结构是一个客体取向 (theme-oriented) 的非及物移动构式 (intransitive motion construction), 其语义成分包括客体 (four Chinese surveillance ships), 目标 (Japanese-controlled waters) 和移动事件 (entered)。在该移动构式中, 作为主语的 four Chinese surveillance ships 充当在状态或位置上发生变化的客体论元。由于客体自身不具有移动行为能力, 从深层语义上分析, 客体取向的非及物移动构式存在一个潜在的致使移动构式 (caused-motion construction), 潜在的致使移动构式以有生命性和行动意向的施事为取向, 语义成分包括施事即致使者 (causer)、客体、目标和致使移动过程。致使移动构式编码的是交互性事件, 反映了事件参与者的互动。图式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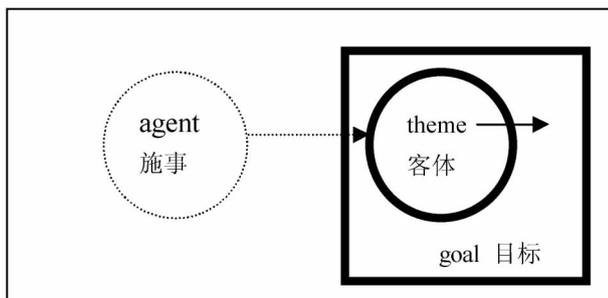


图 2

theme= four Chinese surveillance ships

goal= Japanese-controlled waters around those islands

agent= Chinese authorities 虚圈表示隐匿, 粗圈和粗框表示凸显

上图表明, 非及物移动构式中, 客体与目标都是凸显的。Agent 这一角色可以通过推理唤起, 但在语言层面是背景化和隐匿性的。从及物性看, 非及物移动构式

类属于非及物构式, 致使移动构式类属于典型及物构式。Goldberg<sup>[21][118]</sup>提出, 典型及物构式具有这样的原型意义: 施事传递某种力量和影响, 而受事或客体被动接受来自施事的力量和影响。双方力量和影响的单向传递体现了关系的不对称和权力的不平等。显然, 潜在的致使移动构式传递的信息是, 中国官方指使中方船只进入日本海域。在特定的语境下, 这一信息传递的相关意义是, 中国挑衅甚至是入侵了日本。报道者以客体取向的非及物移动事件来转喻致使移动事件, 可以避免直接指责中国政府, 间接地表达自己的政治立场, 为其报道披上客观的外衣。

通过“移动事件”代替“致使移动事件”的手段, 美方报道将中国消极地塑造成恃强冒犯邻国的挑衅者和侵略者。该转喻以“中国船只进入日本海域”这一客体取向的移动事件来掩盖报道者对“中国挑衅日本”这一主观评价, 前者是一个客观描写的移动事件, 后者是一个评价性的交互事件 (interactive event)。美国媒体关于钓鱼岛的涉华报道使用移动事件来转喻交互事件, 这一识解方式则是将主观评价和意图隐藏于貌似客观的报道, 实现客观化陈述的框架化策略, 通过“客观”的自我标榜, 蓄意将中国塑造成一个肆意威胁和侵犯邻国的强权形象。

## 六、识解的主体性

语言可以通过隐匿交际情景的某些关键构成 (如说话人) 而使其意义 (或世界表征) 最大程度地客观化。这就是识解的主体性所具有的功能。通过对话语所表征的概念化或识解操作的认知语言学分析, 最终能够揭示交际事件中说话人的在场及其特定的识解<sup>[22]</sup>, 从而揭示话语的意识形态立场。

Langacker<sup>[11]</sup>阐释了观察的主体性 (subjectivity) 与客体性 (objectivity): 主体性识解是观察者的特征, 强调观察者作为台下的、不能被观察到的感知主体这一角色特征; 相反, 客体性是观察对象的特征, 强调台上的、能观察到的注意之焦点。不排除观察者同时也可以成为被观察的对象。当观察主体与客体的不对称性最大化时, 观察主体具有最大程度的主体性, 客体具有最大程度的客体性; 作为台下的、不能观察到的观察者表现出最大程度的主体性; 台上的观察对象则表现出最大程度的客体性。因此, 客体性主要体现为显性, 主体性主要体现为隐性。而隐性不等于不存在, 最终构成意义的概念化超越了“台上的”、客体性的显性

内容,而包容了台下的隐性的观察者的理解和呈现方式<sup>[11](77)</sup>。比如,在美国媒体关于中国西藏的报道中,报道者的角色往往是“台下的”(off-stage)、隐性的,其效果是隐匿了报道者的主观判断,将其报道内容以最大程度客体性呈现出来,使其关于西藏这一世界表征最大程度地客观化。

将话语参与者的客体性最大化的手段之一就是通过对第一人称和第二人称的代词(I, you, we, 及其各种变体形式)来使台下的主体成为台上的观察对象并在语言上凸显出来<sup>[11](78)</sup>。另一方面,说话人、听话人、言语事件、当时语境(时间、地点)等与言语事件直接有关的因素构成了“背景”(ground)。背景最典型的特征是“台下的”、具有最大主体性。隐性的背景往往作为隐性的参照点来界定台上的、具有最大客体性的识解对象。语境因素的隐性参照点作用不仅体现在语法上,如时态,还体现在词汇的使用上,如情态动词、(定冠词设定的)名词的有定性(definiteness of nouns)以及副词,如here, there等。借助这些语言特征可以锁定参照点,追溯其来源。

在美国媒体的报道中,虽然没有使用“we”等词来将报道者自己的角色客体化,但其竭力作正面宣扬的“反对中国共产党政府的统治”、“宗教自由”、“民族独立”、“人权”等明显属于西方意识形态阵营:

(6) Tibetans are burning themselves to death in protest of China's iron grip on their homeland.

*The Washington Post*, 7 October, 2009

美国为首的西方政治立场和意识形态在其媒体对中国西藏事件的观察和描写中起着隐性参照点的作用。美国媒体竭力以西方的政治立场和意识形态来影响人们对西藏事件的认知。可见,美国媒体在报道中并不完全是客体性的。作为观察和描写中国西藏事件的隐性参照点,美国媒体的政治立场与意识形态是其关于西藏的意识形态话语建构“内群体”的基础,不仅决定了美国媒体对“内群体”的界定和刻画,也决定了其对“外群体”的界定和刻画。

## 七、小结

从认知语言学的角度看,话语的意识形态立场往往蕴含于隐喻、转喻、注意、构式以及对观察者的主体性处理中。这些概念化认知方式有的是通过对目标域

的片面性、主观性凸显和隐匿来实现特定的意识形态表征功能,有的是通过语言结构的不对称特征来表征不平等的社会权力关系,有的则是通过观察者在话语中的特定处置方式来实现其意识形态功能。这些概念化表征方式载了话语中不平等的社会权力关系而表现出同话语意识形态的连贯性特征。因此,批评话语分析有必要吸收认知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将对意识形态根源的探究从语言层面深入到认知层面。

### [参考文献]

- [1] Fairclough, N. *Discourse and Social Change* [M].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2.
- [2] van Dijk, T. A. Discourse and society: a new research journal focus [J]. *Discourse and Society*. 1990 (1): 5-16.
- [3] van Dijk, T. A. *Discourse and Context*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 [4] van Dijk, T. A. *Society and Discourse*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 [5] Teubert, W. *Meaning, Discourse and Society*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 [6] Musolff, A. What can critical metaphor analysis add to the understanding of racist ideology: recent studies of Hitler's anti-semitic metaphors [J]. *Critical Approaches to Discourse Analysis across Disciplines*, 2008, (2): 1-10.
- [7] Lakoff, G. & Johnson, M. *Metaphors We Live by* [M]. Chicago: The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1980.
- [8] Koller, V. Metaphor clusters, metaphor chains: analyzing the multifunctionality of metaphor in text [J]. *Metaphorik.de*, 2003 (5): 115-134.
- [9] Charteris-Black, J. *Corpus Approaches to Critical Metaphor Analysis* [M]. Basingstoke & New York: Palgrave-MacMillan, 2004.
- [10] Lakoff, G. *Don't Think of an Elephant: Know Your Values and Frame the Debate* [M]. Hartford: Chelsea Green Publishing, 2004.
- [11] Langacker, R. W. *Cognitive Grammar: A Basic Introduction* [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 [12] van Hoek, K. Pronominal anaphora [A]. In Geeraerts, K. and Cuyckens, H. (eds.). *The Oxford Handbook of Cognitive Linguistics* [C].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890-915.
- [13] Barcelona, A. Reviewing the properties and prototype structure of metonymy [A]. In Benczes, R., Barcelona, A. and de Mendoza Ibanez, F. J. R. (eds.). *Defining Metonymy in Cognitive Linguistics: Towards a Consensus View* [C]. Amsterdam /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2011: 7-60.
- [14] Radden, G. & Dirven, R. *Cognitive English Grammar* [M].

- Amsterdam and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2007.
- [15] Quasthoff , U. Social prejudice as a resource of power: towards the functional ambivalence of stereotypes [A]. In WODAK , R. (ed.). *Language , Power and Ideology: Studies in Political Discourse* [C]. Amsterdam and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1989:181 - 196.
- [16] Evans , V. & Melanie , G. *Cognitive Linguistics: An Introduction* [M].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06.
- [17] Panther , K. Metonymic reasoning inside and outside language [A]. In Makkai , A. , Sullivan , W. J. and Lommel , A. R. (eds.). *LACUS Forum XXXI: Interconnections* [C]. Houston: LACUS ,2005.
- [18] Bar-Tal , D. Formation and change of ethnic and national stereotypes: an integrative model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tercultural Relations* ,1997 ,21(4) :491 -523.
- [19] Yamamoto , M. *Agency and Impersonality: Their Linguistic and Cultural Manifestation* [M]. Amsterdam /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2006.
- [20] Hart , C. Moving beyond metaphor in the cognitive linguistic approach to CDA :construal operations in immigration discourse [J]. In Hart , C. (ed.). *Critical Discourse Studies in Context and Cognition* [C] ,2011 ,(7) :171 - 192.
- [21] Goldberg , A. E. *Constructions: A Construction Grammar Approach to Argument Structure* [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5.
- [22] Verhagen , A. Construal and perspectivization [A]. In Geeraerts , D. and Cuyckens , H. (eds.). *The Oxford Handbook of Cognitive Linguistics* [C].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48 -81.

(责任编辑:高生文)

## Cognitive Linguistic Approaches to CDA

ZHOU Hong-ying

(Department of Military Diplomacy , PLA International Studies Institute , Nanjing 210039, China)

**Abstract:** A Cognitive Linguistics-oriented CDA starts from but goes beyond the linguistic usage to the underlying cognitive activities to deconstruct or reconstruct the process in which the discourse producer legalizes the in-group ideology by manipulating conceptualization of readers. Discourse is the product of particular ideology. The different representations of conceptualization in a discourse, including metaphor, metonymy, attention, subjectivity of observer, are loaded with unequal power relations and thus manifest coherence with the ideology of the particular discourse.

**Key words:** CDA ; ideology ; cognitive linguistics